

文艺真实性一解

中文系七八级学生 宋宪文

别林斯基说：“现实主义有两个基本条件：真实的外界的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的表达。”我想着重谈谈自己对别林斯基所说现实主义的后一个基本条件的理解，谈谈文艺的真实性怎样要求正确的反映人们（包括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评论文章很少把这个问题纳入文艺真实性的范畴，现在有必要强调一下。

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2页）马克思的话，明白无误地指明，作为艺术范畴的“人的本质”的内涵，不仅包括现实的人的全部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必须包括人的全部精神生活条件，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变，相互制约的无限复杂的关系。所以作为艺术范畴和艺术描写对象的只能是“人的本质”即社会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感性有机整体，而不仅仅是什么“生活现实”、“生活本质”。如果把文艺的真实性应当包括反映人们的（包括作家自己）内心世界这样一个重要内容，硬要从文艺的真实性管辖的领域内除出去，只能是人为地给作家设置一条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文艺的生机仍然会冰结在僵死的框框之中。

高尔基曾经明确指出：“文学就是人学。”文艺的实质就是描写人。写人，就是描写活生生的人，就是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描写人的特定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只有把真实具体的人性和人情表现出来，才能创造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才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通过现实社会中人的关系、人的命运、行为、思想、感情和性格的描写，艺术作品便无从反映社会，无以展现历史的图画，也无以紧紧抓住读者的深切关心并从感情上去打动读者。在文艺创作活动中，我们要从生活实际出发，努力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去描绘同志、亲友、师生、家庭、爱情等不同生活领域的复杂关系，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人物心灵深处的细致、曲折的变化。而在这样做的时候，要牢牢尊重这样一条规律：艺术作品中一个人物的性格一旦形成，就要顽固地按照他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性格，个人气质来思考，行动，说话。按照这个规律始终一贯、首尾照应地来描写人物的言语活动，就能把人物写活，写真，他们的喜怒哀乐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他们的脉搏跳动能让读者摸得着，他们思想上的回旋跌宕能扣动读者心弦。否则就会把人物变成木偶和传声筒。但是，有相当一个时期，文艺真实性的这一原则（即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却交逢了厄运。我们不少的文艺作品，没有也不敢揭示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多种多样的爱好，渴望和精神需要。在这里，对生产过程的描写，空泛的议论说教，豪言壮语，革命词句堆砌，掩盖、代替了对人及其壮美内心世界的描写，以至于使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变成了作家牵着线活动的木偶，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达吉应该哭时而人为地不让她哭，只是这类事例中的一个。至于“四人帮”独霸文坛期间，他们塑造的“高大完美的英雄”更是成了不食人

间烟火的神人，他（她）们没有家庭、没有妻小、没有父母情感、亲子之爱、同志情谊、爱情的欢乐，活灵灵的人都变成了木讷阴郁的泥胎。写到这里，使我们不仅想起基督教会史上有一个所谓“巴塞夜莺”的故事，说的是一群僧侣们由于偶然的机缘，听到了夜莺的歌唱，于是在他们虔诚的死水般的教徒生涯中激起了层层涟漪，他们人人动了凡心。结局是悲惨的，其中多数或疯或死，受到了天谴。这个故事企图说明，对于一个基督教徒来说，任何一点尘世的感情都是亵渎神灵的，都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欧洲中世纪的悲剧一度又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实和文艺作品中出现，这不是极可发人深省的吗？

刘心武同志的新作，就同那种无家庭、无父母、无爱人的“三无世界”式的作品和无人情、无人性的“无情文学”毫无缘分。他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不仅写人，而且大胆地写人的思想，感情，情操和道德观念。谢惠敏是他在《班主任》中塑造的一个发人深思的人物。作者不仅在政治上敏感地发现了谢惠敏这一类人物的问题，并且艺术地再现了这类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典型性格。作者细腻的笔触所勾勒的一个新的灵魂具有这样的特征：品质纯朴、头脑僵化、是非不分、知识贫乏。正是从这样一个鲜明的艺术形象里，人们痛切地感受到“四人帮”愚民政策的严重恶果，看到了受害青年灵魂深处的病痛，真正引起了人们疗救的注意。

最近轰动影坛的影片《小花》在这方面的刻意追求和大胆探索，更具有突出的说服力。影片《小花》冲破了传统的影片表现手法，不是按情节的逻辑来结构剧情，而是以赵小花兄妹三人的情感，他们意识中的闪念和回忆来结构剧情，记叙故事。这种不在交待事件和情节上浪费笔墨，而全力渲染兄妹丰富情感和人物命运的结果，使影片产生了一种真实的魅力，令观众很容易地情不自禁地走进戏里，把主人公的命运看作是自己的命运，和他们同悲欢、共患难。

看来，作家要敢于把笔触伸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雕塑各种各样的灵魂，的确是创作真实文艺的一条正途。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那里顾虑重重、趑趄不前呢？

当然，充溢在作品中的强烈感情不独是作品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本人的。高尔基也说过这样的话：“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414页）赞成或反对，自然就有情在。曹雪芹说他写的《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鲁迅讲“创作总根于爱”。刘心武谈“我在学校工作时，谢惠敏这样的学生给我带来最多思虑，激起了我最强烈的痛惜与切望交织的复杂感情。”中外文学大师们和有成就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谋而合，雄辩地说明作家们在构思挥毫时总是伴随着激情的。文艺是生活反映，又是对生活评判。艺术家在反映生活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对生活的态度，熔铸到艺术形象中去。作品对生活的任何反映，都包含着艺术家的立场和审美态度。文艺作品对生活的描写，不是对生活冷冰冰的摹写，而是表现出艺术家的爱憎，反映出艺术家对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丑恶事物的痛恨和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满腔热情地追求。作家们所以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摄取某些人物和题材作为描写的对象，往往由于这些人物和题材曾使他们受到过强烈刺激或感动。作家的这种感情总是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没有生活的土壤，情感就如同鲁迅所说：“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坟·未有天才之前》）

特别是在革命大变革的激流中，其中包含多少悲欢离乱，多少血与火的斗争，多少家

庭、个人命运的浮沉，多少思想、情感和性格的复杂的变化……文艺家们沉浸在对生活的思索之中，怨愤、焦灼、欢乐、痛苦等复杂的情感在他们的心扉中潮涌泛滥着。作家在积累了相当多的生活素材以后，这时生活中的某些人物和事件，特别吸引了他，打动了他的心，使他悟出了深刻的道理，激起了感情的浪花，产生了要把它反映和描写出来的创作冲动。一个作者的激情愈强烈，思想愈敏锐，联想就越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在尊重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想象和虚构，把一定的事物形象与人物的思想感情相结合，把二者与作家的思想感情融成一体，这样就会构成完整、丰满、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从而使得整个文艺作品显得更加有光彩、有力量。

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作家与读者被隔上一堵冰墙，彼此只能“红楼隔雨相望冷”，根本没有真情实感的交流。作家不是笔的主人，而是笔的奴隶。在有些“作家”那里，个人的真实感情藏得深深的，生活中激烈而真实的矛盾冲得淡淡的，能生动地表现个性棱角磨得光光的。他们或者按照一种模式，作一些图解政策和指令的工作；或者象绕轴旋转的风信标一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说着一些花样翻新的空话、大话、假话。不包容个人真情实感的作品，既难以揭示出时代的真谛，也不会赢得读者的心，在读者的心目中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而那些秉笔直抒，敢遣真情上笔端的文学家们的作品，其艺术感染力却历久不衰，今天读来，仍是那样强烈地牵动我们的情怀，叩响我们的心扉。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们不是又可以窥见文艺作品的真实性的一些“秘密”吗？

总之，我认为，如果不强调内心世界的忠实的表达，而是仅把反映“生活现实”，“生活本质”这样一些笼统、抽象的要求作为前提提出来，就有可能抹煞文艺的特点，有害于文艺创作，许多图解概念的作品往往就是从这个思路来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内心世界既不是主观意志的无限膨胀、扩张，也不是内省体验的虚妄幻觉，它只能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且它和真实的外界描写是相互渗透的辩证统一体，决不是对立的两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艺真实性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

简 讯 四 则

△四月二十五日，山东省政府顾问、政协副主席余修同志应邀来我校作革命传统报告。在报告中余修同志讲述了我党光荣革命传统，批判了林彪、“四人帮”践踏和破坏我党革命传统的罪行，提出了恢复和发扬我党革命传统的殷切希望。他的报告，使师生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

≡ ≡ ≡

△四月二十五日，山东师院副院长田仲济教授应邀来我校作学术报告。田仲济教授在讲演中，对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史料问题和观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师生和有关同志听后很受启发。

≡ ≡ ≡

△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二日，曲阜师院心理学教研室讲师朱本同志应邀来我校进行心理学